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奋起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奋起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奋起 / 杨天石著.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5. 9
(杨天石评说近代史)
ISBN 978-7-5177-0305-1

I. ①奋…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历史 - 近代史 - 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0646 号

书 名: 奋起

著作责任者: 杨天石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305-1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联系电话: (010) 88919581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z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88333349 6899063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370118561@qq.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新 序

毛泽东 1935 年 10 月所作《念奴娇》词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毛泽东此词写的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昆仑山。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之间，蜿蜒伸展至青海境内，全长 2500 公里，平均海拔 5500~6000 米，宽 130~200 公里，总面积达 50 多万平方公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它被称为“万山之祖”，又被视为中华“龙祖之脉”。毛泽东在词中描写了它的雄伟阔大的气势和悠远绵长的历史，叙述了它对中华大地、中华民族的“功罪”，慨叹于“谁人曾与评说”。

昆仑山可以“评说”，历史、中国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何尝不可以“评说”？

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重视历史。历史被认为是正衣冠、知美丑的镜子，是辨善恶、考得失、增经验、长智慧的教科书，因此，它应该被人“评说”，任人“评说”，特别是自由“评说”。

首先是“说”。历史已逝，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靠历史学家“说”，用嘴、用文字或用图像，它才能广为人知，传之久远。历史学家要充分掌握资料，精细考辨，力争说得真实、准确、全面，尽最大可能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不能“胡说”。“胡说”的结果必然谬种流传，贻误读者。其次是

“评”。“评”能表现历史学家的理解、议论和价值判断。在“说”与“评”之间，“说”最重要。“说”是基础，只要“说”得真实、准确，广大读者都可以根据你所“说”的史实，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论。这一方面，我们要高度相信读者。多年来，我是主张先“说”后“评”、多“说”少“评”，甚至可以只“说”不“评”的。最不应该的是，不把史实说清楚、道明白，就急于将自己的评论强塞给读者。至于为了某种功利的需要或某种目的，有意掩盖、“虚无”、扭曲、夸大部分史实，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史实”，那就更等而下之，应该坚决反对了。

世无超人，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不足。任何人都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真理，同样，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一次就认识全部历史真相。历史学家所“说”、所“评”，都可能不当、不妥、不全，甚至大谬不然。怎么办？百家争鸣呗！毛泽东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艺术和学术的唯一办法，是清除谬误、探索真理的正确途径。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一花、一派、一种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如果从1958年选注《近代诗选》开始计算，笔者从事近代史研究已经57年。如果从弃文从史，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起计算，也已经37年。笔者所写论文、札记曾选编为“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本出版。出版后此套书一再加印，甚至被盗版。由于这套书部头大，读者捧起书像捧起一块大砖头，颇多不便，因此，台湾地区风云时代出版公司曾以“揭开民国史真相”为总题，改出七卷本。现在中国发展出版社以“风云版”所分为据，稍作调整，仍为七卷。应该说明的是，笔者2009年以后所作，因另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二辑、第三辑等专书，本套书暂未收入。

书中“评说”难免谬误或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教。

杨天石

2015年8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原 序

人们生活在今天，规划并创造明天，自然希望了解昨天。昨天就是历史，一切过去了的都是历史。

了解历史的最重要的办法是阅读历史著作。自然，这样的历史著作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假的或掺了假的历史著作，人们不会愿意看；讳饰或有所讳饰的历史著作，人们也不会乐意看。但是，历史著作要达到真实、客观、公正，并不容易。这是由于：其一，历史创造者的活动常常具有诡秘性，许多事件，策划于密室，进行于幕后，公开者、示人者往往一鳞半爪，半真半假，甚至全假。其二，历史本质的显露需要一段过程，在这一过程尚未终结之前，人们一时还难以全面认识其本质。其三，历史创造者分为不同的派别，各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即使对同一事件，也常常会有不同的陈述和评价。其四，历史的记录者大都有自己的倾向、爱憎，其记录自然也难免反映这种倾向和爱憎，有某种偏见、局限、谬误、片面性在所难免。其五，许多事件没有记载，或挂一漏万，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研究历史难，写出真实的、客观的、公正的历史更难。历史学家的可贵就在于能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尽最大可能为世人记录、再现、还原真实的历史本相。达到了这一境界，就达到了历史科学的基本要求。

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常常并不将历史学看作科学，而是将之视为工具——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或者是一种宣传工具。例如政治家常常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利用历史来宣扬本派主张的正确，批评对立派别的谬误，或者

用来宣扬某种于己有利的观点，以期影响社会，塑造舆情，争取群众，为己服务。权力机构会为史家规定这样、那样的禁律：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写；必须如何写，不能如何写之类。其结果是：有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张扬之，放大之，变造之，奖掖之；不利于某派或某种需要者，隐匿之，缩小之，扭曲之，禁绝之。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历史，往往妍媸随意，美丑随时，真正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哪里有真实可言，哪里有科学可言！

当然，历史学必须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务。中国古代讲究经世致用，于史学，则特别强调其“资治”功能，这都是不错的。历史学如果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要它何用！因此，本书著者赞成史家关注现实，“经世”“资治”，从这个意义上，著者肯定“工具”说的合理内涵，但是千万要注意，史学的这种功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符合历史的真实和本质，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应该违背历史，不能故意扭曲、剪裁历史以为己用。有些人常常不懂得，人们可以被蒙蔽于一时，但却不会被蒙蔽于永远。扭曲者有时会取得某种效果，但有时则反，其效果等于零，甚至是负数。林则徐有诗云：“青史凭谁定是非？”从人类发展的长河来看，历史的真相会大白，是非也会有公论。

本书著者年轻时志在文学，但造化弄人，最终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一转眼已经三十余年。面对历史学的汪洋大海，常生“去日苦多，所成无几”之叹。不过，有一点可以告慰读者的是，本书著者一贯以揭示历史奥秘、追求历史真实为鹄的，决不做讳饰历史、扭曲历史的勾当。当然，由于本书著者的局限，书中各文又成于多年中，自然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问题甚至谬误，诚恳地希望专家、读者指正。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治民国史有其特殊的困难。在这个领域内，政治的干扰和影响最多，未经厘清的史实最多，观点的对立和分歧也最多，本书著者的希望是：在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下，海内外学界切磋讨论，问难攻防，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使民国史著作的科学水平日渐提高，逐渐臻于真实、客观、公正。

著者

2009年8月3日于北京九华山庄

目 录

蒋介石与中国抗战

-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1

抗战时期，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联合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他对内联共，对外联苏、联美、联英，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应该承认，他对战争的胜利有功，甚至可以说有大功。

1937：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年

- 从卢沟桥事变至南京陷落 17

自7月7日至12月13日五个多月时间内，中国军队同时在华北、华东两个战场作战。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逐渐懂得，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必须以空间换时间，必须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懂得运用运动战、游击战。

蒋介石提议国共两党合并 44

抗战初期，两党实行互不包容的党对党的“党外合作”。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中共为了为了维护组织上的独立性，坚决拒绝此议。因此，抗战期间，两党既有合作抗日的一面，又有摩擦、反摩擦和限制、反限制的一面。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对策 63

汪精卫不仅主张与日本言和，而且反对蒋“联共抗日”，不惜以出走作为向蒋抗争的手段。蒋介石坚决揭露汪的投降面目，稳住了抗战阵营。

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运动的珍贵文献

——读宋庆龄往来英文函札 78

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6月14日成立于香港，由宋庆龄发起。其目的为动员和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张学良三次请缨抗日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101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长期软禁，“严加管束”，但是，他抗日之志不泯，渴望走上前线，血洒疆场。

报国无门的苦恼

——读张学良幽居日记 105

现存张氏日记，始于1937年1月1日，充分显示出其爱国主义激情。张学良曾自称“爱国狂”，确非虚语。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115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这些谈判，大都由日本主动，并且最后均由蒋刹车。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153

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孔祥熙的对日谋和活动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代表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实出人意料，蒋介石对这些谈判大都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批评，甚至以极为严厉的态度加以阻遏。

“桐工作”辨析 184

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角力”，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是一种“斗智”行为，不能要求双方“忠诚老实”，他们在谈判中说假话，提供假材料、假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223

姜豪香港谈判，其目的在于阻止日本支持汪精卫组织伪政权；日方则企图以此诱惑重庆政府坐到谈判桌前。

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232

司徒雷登受日本人之托，多次出入武汉、重庆，会见蒋介石。有关资料，不仅真实地反映出抗战期间中日秘密的发展历史，也真实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到穷蹙困窘的没落历程。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 247

蒋介石声言“抗战到底”，这个“底”，逐渐变化。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发展为收复包括东北、台湾在内的所有失地，到解放朝鲜等亚洲被侵略民族，再发展为与盟国共同作战，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条件之胜利”。

吴开先等与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敌后抗日工作

——读台湾所藏朱家骅档案 277

上海统一委员会成立后，部分国民党人和文教界人士纷纷变节的情况得到扭转，敌后抗日工作呈现起色。

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

——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 290

江苏人陈中孚、安徽人何世桢，按二人在汪伪政权中的职位，理应列入汉奸行列。但是，此二人在抗战胜利后都没有受到惩罚。原来，他们是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

蒋介石与中国抗战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志：

很高兴今天我能到这里来作一个关于蒋介石和抗日战争的报告。我想这是历史的进步。

蒋介石是 1975 年去世的，到现在已经 30 多年了。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蒋的棺早就盖上了，但直到现在，对蒋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蒋在抗战时期有几个身份。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是领导军事的。一个身份是国民党的总裁，是领导整个国民党的。在抗战后期，他是国民政府主席，是领导当时的中国政府的。他还有个身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是指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的。对此人如何评价？特别是他在抗战过程中的作用应该如何评价？这是认识中国近代史、认识抗日战争史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今年以来，连战、宋楚瑜、郁慕明相继访问大陆，两岸关系、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来重新认识、重新讨论蒋介石的评价问题，是应该的、必需的。

大家都知道，对一个问题的正确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完成。对蒋介石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认识，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百家争鸣的过程。所以我今天的报告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是提供一家看法，请诸位思考、讨论、研究，如有讲错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

我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

“联共抗日”的对内政策。第二个问题，讲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到底，直到最后胜利。第三个问题，讲蒋介石实行联苏、联美、联英的正确的外交方针，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第四个问题，讲蒋介石在抗战过程中的功与过。

一

先说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从1924~1927年。蒋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参加者，在1926~1927年之间，蒋领导了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从此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所谓的“十年剿共”时期，或者说“十年内战”时期。从1927~1937年，国共两党生死搏斗。同时，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的时期，在这十年里，蒋介石提出了一个方针，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这个政策提出了新看法。要攘外，要反对日本侵略，当然内部要团结，要统一，要稳定。如果内部不团结，不统一，怎么可能攘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六个字有它合理的因素。蒋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他安内的办法，怎样造成一个国内稳定、团结、统一的局面。是用武力消灭异己、消灭共产党，还是采取谈判、双方让步的办法来求得统一呢？我觉得，蒋的错误就在于，他是采用武力镇压的办法，采取剿共的办法，来取得国内的统一。蒋在贯彻“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时候，他不是没有矛盾，其内心也不是始终平静的，例如，1933年1月20日，蒋有段日记说：最近我想了一下，一个是倭寇，这是日本强盗；一个是赤匪（这是他对中共的诬蔑）。必须要丢下一个，专门对付一个。“二者必舍其一而对其一”。蒋说，如果我专门对付“倭寇”，那么国民党、国民政府将来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但是，“以天理与人情推之，今日之事应先倭寇而后赤匪也”。这就是说，从“天理”和“人情”两个角度衡量，蒋认为还是应该首先对付日本侵略者。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从1935年底，他准备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对

苏，一个是对共，特别是对付共产党的问题。正好此时，1935年8月1日，中共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简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是受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影响。“八一宣言”主要内容是号召停止内战，集中国力，召集一切愿意参加抗战的党派、团体、政治家来谈判，成立国防政府。1935年的“八一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最初的一个文件。蒋介石当时有位驻莫斯科使馆的武官叫作邓文仪。他看到了“八一宣言”，看到了当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的讲话，迅速把这些信息通知了在国内的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抓住的时机，马上召集高级干部会议，决定要统一全国的力量来抗日。

此后，蒋介石通过几个渠道找寻和中共的关系，其中一条渠道，也是最重要的渠道，是通过宋庆龄。宋庆龄当时在上海找到了一个牧师叫董健吾。他的公开身份是宗教人员，实际上是共产党员。宋庆龄派董建吾直接到陕北，会见了当时在陕北的周恩来，周又迅速把这个信息转达给毛泽东和张闻天。张闻天和毛泽东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和国民党进行谈判，所以在1936年3月，毛泽东和张闻天给董健吾回了一个电报，表示愿意和国民党谈判。这是1936年国共两党联系的一个开端。有了这个开端，就有了1936年11月陈立夫作为国民党代表，潘汉年作为共产党代表之间的谈判。陈、潘谈判期间，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在此之前，蒋介石正集中大军进攻陕甘宁苏区。这是蒋当时采取的两手政策。一面企图用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中共和中共领导的武装，但同时又围攻陕北苏区。他认为，只要再坚持5分钟，就可以消灭苏区。那时，也确实是中共历史上比较困难的时期。但就在此时，发生了西安事变。在西安事变中，蒋通过宋子文、宋美龄向周恩来提出，只要中共同意三个条件，国共就可以再次联合。一个条件是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一个是取消红军的名义，一个是放弃阶级斗争。只要中共接受这三条，同时服从委员长的领导，蒋认为就可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放出来了，他背弃了自己的一些诺言，

但他表示停止剿共，实行抗日，这点他做到了。西安事变后，1937年，谈判就从原来的陈立夫和潘汉年之间转移到了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1937年全年，他们先在杭州谈判，又在庐山进行了两次谈判。在这些谈判里，共产党所要求的是一种双方平等的谈判，而蒋是采取一种收编、收容和给出路的不平等办法。例如，1937年1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应与共党以出路，而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但须令其严守范围。”2月16日日记称：“对内则编共而不容共。”所谓“编共”，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蒋介石要求把中共的武装纳入国民党掌握下的军队系统，不让共产党成立军部或总部。第二，对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资送出洋。第三，蒋介石要求中共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和其本人的领袖地位。第四，要求共产党取消党名，绝对服从，绝对一致，不能任意组织与活动。在1937年谈判中，焦点是军队问题。1937年6月8日，蒋介石和周恩来谈话之后，在日记中说：“共党必欲将收编部队设一总机关，自为统率，此决不能允许，应严拒之。”7月16日日记云：“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惟能忍而未发耳。戒之。”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谈判，蒋要收编中共的军队，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这自然是谈不成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8月1日，蒋介石采取了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他邀请毛泽东、朱德、叶剑英来南京讨论国防问题。应该说，这是蒋介石跨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中共中央收到邀请以后，毛泽东没有离开陕北，而是派了三人去南京，即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他们到了南京后，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红军的改编，一个是陕甘宁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共做了让步，蒋介石也做了让步。这个让步表现在，中共所领导的红军决定接受改编，称为八路军，后来称为第十八集团军。中共把自己领导的红军归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称为第八路军，这是中共做出的巨大让步。

第二个让步，中共决定把陕甘宁苏区改称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领导下的一个特殊地区。在决定改称过程中，蒋介石也做了让步。最初，他准备派一个国民党员去做这个边区的政府主席，但中共坚决拒绝。

最后蒋介石做出让步，同意中共的林伯渠担任边区政府主席。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播发中共的一个文件，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里，中共表示了4条。第1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第2条，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的政策。第3条，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第4条，取消红军的名义和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且待命而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肯定了中共的这个宣言。中共的这个合作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由于两党合作，因此就形成了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所领导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这两个战场在抗战过程中起到了互相照应、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的作用。

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以后，蒋介石就开始调整国内政策。第一个表现是，蒋介石接受周恩来的建议，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二个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宣布恢复毛泽东、周恩来等26位同志的国民党党籍。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在20世纪20年代都是国民党人，而且毛泽东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部长。在1927年“清共”的时候，国民党把毛泽东、周恩来都开除了。现在，国民党宣布恢复他们26人的国民党党籍。第三是，蒋于1938年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第四，蒋在武汉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在一定的意义上，开放了政权。第五，蒋想找寻一个新的国共合作形式。当时，他想把国共两党合并成一个大党，名为“国民革命同盟会”。中共对此提出，合并不好，希望采取新的办法，即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党，而且可以参加国民党当时刚刚组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介石要求两党合并，一方面表现了他想取消共产党这一意图，但至少此时，他也希望两党有一个更密切的合作关系。所以说，从1937年卢沟

桥事变开始，到1938年的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个时期，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因此国外有人说，这是两党的“蜜月期”。此时两党比较一致，矛盾较少，纠纷较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看出来。毛泽东在这篇名为《论新阶段》的文章中说：“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他在讲话中给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例如毛称蒋是民族领袖，是最高统帅。他说，在国共两党里面，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是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而且还说，国民党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和蒋介石前后这两位伟大的领袖。这个评价应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篇文章，大家在《毛选》里找不到，但可以在中央档案馆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里找到。毛泽东之所以会讲这段话，是因为这个时候，两党合作比较好，国民党、蒋介石比较努力地抗战，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才给了这么高的评价。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执行了一条正确的对内政策——联共抗日。后来，国共两党之间虽然也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但是，一直到抗战胜利，两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关系始终维系着。

二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坚持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大家知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对日本长期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蒋之所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一个是因为他要剿共，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另外一个更大的原因，是因为蒋害怕日本的武力。他认为中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比不上日本。他有个思想，后来我们概括其为“三天亡国论”。他说，中国军队要和日本打起来，只能是有败无胜。日军在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可以截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命脉，从而灭亡中国。这就是蒋介石的恐日症。国民党内部